

“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

戴宇辰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威廉斯——西尔弗斯通——媒介化研究”之欧陆媒介社会学研究理论史的回顾，展现“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媒介研究的关联的可能性。除去引言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本文将探讨雷蒙德·威廉斯所开创的电视文化研究传统中蕴含的ANT研究视角；以此为契机，本文在第二部分进而转向西尔弗斯通的传播“驯服”研究，考察为何ANT与媒介研究“短暂邂逅”；在第三部分中，本文将考察欧陆“媒介化”研究的崛起以及ANT与媒介理论在的“再次相遇”；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本文将讨论ANT对未来媒介（化）研究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

行动者网络理论、流动的藏私、驯服研究、媒介化研究

作者简介

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电邮：yundai@dlps.ecnu.edu.cn。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860005）阶段性成果。

The Old Acquaintances with a Reunion: Actor-Network-Theory and the Future of Media(tization) Study

DAI Yuchen

Abstract

Through the tradition of European media sociology study from Williams to Silverstone then to mediatization study, this paper aims at presenting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edia study and Actor-Network-Theory (AN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go with Williams' famous research of television and social changes. It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mobile privatization" is inherently connected to ANT's perspective of techniques. Then it will turn to Silverstone's media domestication research and analyze why ANT has a separation with media study. The third part is

consisted of the reunion between ANT and mediatization study and highlight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ulding force” of media comes from ANT’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 the future of media(tization) study in terms of AN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 the last part.

Keywords

Actor-Network-Theory, Mobile Privatization, Domestication Study, Mediatization Study

Authors

Dai Yuchen, Ph. D., is a lecturer i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ycdai@dlps.ecnu.edu.cn.

This paper is funded b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Project No. 19YJC860005).

引言：“为什么行动者网络理论没有与媒介理论相关联？”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以下简称ANT）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下简称STS）传统，它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任何既定的社会“现实”（reality）都是一系列复杂关系（ANT称之为“网络”）互动的产物。在这些复杂关系网络中，既存在着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humans）行动者，也存在一切非人类（nonhumans）行动者（例如技术、人造物）。当一个网络中的诸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结成“联合”（associations）以后，ANT认为，一个既定的社会场域才得以构型（Latour, 1987）。作为STS传统（STS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如何被引入社会）的分支，ANT尤其关注于作为物的“技术”是如何进入所谓的社会场域（“网络”），又是如何“稳定化”（stabilize）社会联结。以其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观点来看，ANT同时反对“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社会场域的变迁以及“技术反映论”——技术是社会变迁趋势的反映，他们的研究焦点在于“技术的社会形塑”（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Latour, 1996a）。

理解技术的社会形塑就是去考察技术及其实践网络之间的动态关联。更进一步来看，ANT的出发点在于科技物本身是如何建构起社会联结（social links）：首先，技术物——或者用拉图尔更青睐的术语来说，“非人类”——并不存在着一种先验“本质性的规定”。对技术的理解必须被置于技术物本身所处的“网络”（network）之中，亦即观察其在该网络中的实践建构过程；其次，一个网络得以构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诸种行动者（actors）（即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例如“技术物”）的所组成的“联合”。当行动者之间的意愿通过转化得

以稳定之时，用ANT的话来说，一个网络就成为“黑箱”（black-box）；再次，网络中每一位行动者力量的实现是通过“转译”（translation）来完成的，即制造差异，其他行动者的意愿通过“转化”而非“表征”（represent）的方式呈现出来；最后，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开启“黑箱”，展现既定行动者网络中的联结与部署，即不同行动者的“行动轨迹”（Latour, 2005）。

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作为“技术物”的媒介则一直是历年来媒介社会学考察的核心命题之一。在过往的研究中，它们或是被置于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媒介以其自身的“偏向”结构社会形态（Innis, 1951），或是被理解为承担既定社会功能的一种“工具形式”（Lazarsfeld & Merton, 1957; Lasswell, 1948）。这种将“人”与“物”的考察分离，忽略“媒介的实践过程”只关注“媒介本身”的研究路径在近些年传播研究的反思中被诟病颇多，Nick Couldry就曾撰文批评了这种静态的研究范式，提出“要将媒介理解为一种实践而非单纯的符号文本或者社会结构产品，从而转向一种关于实践理论（a theory of practice）的社会学考察”（Couldry, 2004）。

从学理上看，以ANT为代表的STS传统独特的技术观正与当前媒介社会学研究对“媒介实践”的强调不谋而合，ANT的“行动者网络”恰恰是“媒介实践的网络”。当然，两者的关联也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想象。台湾学者江淑琳就曾试图概括两者相互整合的可能性：“STS不仅只研究科技物本身，也研究科技物的发展过程，摒弃科技决定论，也反省社会决定论，同时思考科技与社会之相互形塑（mutual shaping）、相互生产（coproduction）。传播学者则是借用STS领域的概念来分析传播科技与传播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江淑琳，2016：ii-iii）。同样，我们在近年来传播研究中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也可以发现，传播的落脚点在于考察特定媒介技术对于实践的形塑作用（Park & Wiley, 2012）。这也正有意识/无意识地呼应着STS对于“技术介入社会构型”的关注。

特别是在晚近十年左右，STS领域的“传播转向”显著增多，已经有学者试图借由STS视角重构传播研究，从而“嫁接STS与传播研究的桥梁”（Boczkowski & Lievrouw, 2008）：例如Judy Wajcman和Paul K. Jones就尝试通过“（STS）社会理论框架重构媒介理论”（Wajcman & Jones, 2012）。亦有传播领域的学者试图借助STS的理论成果来理解媒介实践（De Valck, 2006）。但是令人遗憾地是，在STS和媒介主体研究越来越相互交融的今天，STS的代表理论——ANT，仍然没有与媒介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理论联系。Couldry的话颇有趣味：“讽刺地是，ANT并没有与

媒介理论‘相关联’（ANT is not ‘networked’ with media theory）”（Couldry, 2008: 93）。本文的出发点源于ANT对于技术及其社会效应的独特理解——拉图尔拒绝将技术化约为单纯的“物质性人造物”（material artifacts），也拒绝对其做“符号性文化”（symbolic culture）解读；相反，他推崇的是将技术的使用与其实践网络相关联的过程性考察框架（Latour, 1992）。基于此，本文尝试勾勒出一条“另类的”（alternative）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史框架：即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开创的关于电视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至20世纪90年代，由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所领衔的信息传播技术的“驯服”（domestication）研究，再到新千年以降、以Stig Hjarvard、Friedrich Krotz、Nick Couldry为代表的欧陆“媒介化”（mediatization）研究。说其另类，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要点：首先，与所谓“主导范式”（dominant paradigm）的美国行政学派（Gitlin, 1978）相比，欧洲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显然不仅仅关注的是“作为工具的媒介”，而是将媒介与其社会实践挂钩；其次，即使在“正统的”欧洲范式中，欧陆媒介社会学往往被归结于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以及早期关注文化批评的威廉斯）领导的“文化研究”范式之内，即关注“媒介话语的特定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受众对其的主导性/妥协性/对抗性解读”，在此种视角之下，受众的“能动性”（agency）往往被定位于对于（媒介文本）特定意义结构的内化与消耗之中（黄典林，2016；黄典林，2018）。而本文所探讨的这条脉络恰恰是始于展开“文化社会学”转向的中后期威廉斯，即关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物质性及其相伴随的物质性实践（Williams, 1995；Williams, 2005），这也使得他与同属英国传统的霍尔拉开了距离。

另一方面，在该条思想史“断裂”（与美国行政学派的“断裂”以及与霍尔取向的文化研究学派的“断裂”）的背面，却存在着时常被人忽视的“连续性”：威廉斯对于电视的定位直接启发了西尔弗斯通驯服研究中所提倡的“方法论”，他甚至亲自为威廉斯的著作再版做序，坦言自己对威廉斯的继承（Silverstone, 2003）；而诸如Andreas Hepp这样的媒介化团队研究者也特别强调威廉斯的技术观与媒介化研究的诸多耦合（Hepp, 2013a: 46-68）；同样，西尔弗斯通的驯服研究也直接启发了媒介化研究中对于“媒介情境”的关注（Hepp & Krotz, 2007）；最后，我们也应在这条脉络中辨析出诸学者们共享着非功能主义/技术决定论的另类“媒介观”——像Couldry就将功能主义观称为当代媒介研究中的三大“迷思”（myth）之一（Couldry, 2005）。在他们那里，“媒介”与“社会变迁”并非处于线性因

果关系的两端，由一方来决定另一方，而是双方处于一种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变化之中：可能存在着媒介对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入侵与改造，也可能存在着既定社会实践通过媒介创造出新的关系形态。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这条媒介社会学“隐秘”脉络的钩沉，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在过往的传播理论史中，ANT是否曾与媒介研究有过相遇的可能性？（2）倘若两者曾有过短暂“关联”，这段历史又是因为什么而被遮蔽？（3）在欧陆传播学界由“媒介研究”（media study）转向“媒介化研究”（mediatization study）（Krotz, 2009; Friesen & Hug, 2009）的今天，ANT对传播学者又意味着什么？

一、技术及其实践轨迹：雷蒙·威廉斯的“ANT视角”

在《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这部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中，威廉斯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电视既是一种具体化的“技术手段”，又是营造特殊情境的“文化形式”。这一路径显然与美国主流的“行政学派”不同，它区分了“媒介”与“媒介使用”两个层面的社会影响。具体说来，如何理解电视的“两重性”（技术与文化形式）关联到如何去定位“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威廉斯在这儿首先追问的是技术与社会的“因果关系”（cause-effect）：“如果技术是原因的话，我们最好寻求去控制它带来的（社会）影响；或者说如果技术是（社会）使用的结果，那么我们应当将其使用的经验与哪种原因、哪种行动关联起来？”（Williams, 2003: 2）这一疑问显然不是某种“形而上学式的”抽象，它关切媒介社会学者究竟是如何理解（媒介）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联。经验地看，一项具体的媒介技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社会属性，它既是（1）一种具象的物质性载体，是既定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工具性产物，蕴含了生产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技术性手段；又是（2）一种创造、传播和占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独特手段，它的使用可以再生产出新的意义情境与文化形式。诚如Boczkowski和Lievrouw两位学者所言：“媒介信息技术既是文化性的物质（cultural material）又是物质性的文化（material culture）”（Boczkowski & Lievrouw, 2008: 955）。

技术的两重性使媒介社会学研究面临着一道“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关口。威廉斯认为，既存的两条研究路径（1）“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有其强大的本质逻辑，新的技术的发明会引发社会变革，现代化的人与现代化的社会正是由现代化的技术所带来的，以及（2）“技术症候论”（symptomatic technology）

（威廉斯语）——认为技术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偶然的“症候点”，是其变革过程中的副产品（by-products）；只有当技术被运用到既存的社会结构之中是它才会产生其应当具备的效果，都不免共享了同一条预设，即“将技术抽离于社会”（abstract technology from society）：

在“技术决定论”中，（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被假定为自我产生的（self-generating）。新的技术仿佛在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中被发明出来，然后创造了新的社会或者说新的人类生存场景。同样，“技术症候论”也假定（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是自我生产的，但却是以一种更为边缘化的（marginal）方式。我们在（社会变革的）边缘地带发现了它，然后去使用它（Williams, 2003: 6）。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两条路径都忽略了技术的自我变革与社会的变迁本身是系统性地关联在一起的：前者认为技术的发展独立于社会之外，但却最终成为了社会变化得以可能的驱动力；而后者则把技术化约为社会变迁的产物，它为新的生活方式得以展开提供必要的手段。与之相异的是，威廉斯选择了一条“折中的”研究道路：

技术应当被视为由某些已经在脑海中的、确定的意图和实践所发展起来的。但是同时，对于技术的理解又与“技术症候论”不同，这些意图和实践将会被视为“直接性的”（direct）：即确定的社会需求，意图以及实践。对于它们来说，技术并非边缘化的而是处在中心位置（Williams, 2003: 7）。

在这儿，威廉斯“第三条”道路事实上正是ANT所推崇的“技术的社会形塑”。对于拉图尔来说，技术性的人造物“同时是物质性的与社会性的”（both material and social），这意味着“物质性的技术物”本身也存在着“具体的能动性”（specific agency）（Latour, 2005: 83）。而将技术的物理性意义与符号性意义割裂本身是社会学研究者们人为确立的幻象，拉图尔反对的是两种极端的技术观：

避免“技术决定论”的威胁诱惑我们以“社会决定论”去反击它，后者反过来又成为另一种极端（例如，蒸汽机只是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映”）。即使最为包容的工程师们也可能变成一位凶恶的技术决定论者，跳上桌子大声宣布“物理性质料的重要意义”。这一姿态会让一位谦虚的社会学家更为

激烈地拿出某些物的“话语维度”展开反击……两者（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都无法描绘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间的纠缠（Latour, 2005: 84）。

为了克服这种粗糙的“二元论”，拉图尔采取的路径是将一切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例如技术、物）“去本质化”。在ANT的视角下，行动者只是一种关系性效应（relational effect）。纯粹稳固的、个体的、自主的行动者是没有意义的，行动者的身份必须在它所处的联结网络中得到确定。换言之，不存在明确赋予行动者本质属性的制度性要素（例如物质性的/符号性的、自然的/社会的，本体的/全球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单独的行动者并不存在，它只能在与其它行动者的联结中才能行动。一个行动者只是“将空间集聚在自身周围、使其他关联性要素依赖自身、并将他们的意志转译为自己的语言的任意元素”（Callon & Latour, 1981: 286）。也正因为此，在理解“技术的社会形塑”这一主题之时，ANT关注的是“技术物”在整个行动者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它们并非某种消极的、被动的、被规定着的质料，而是拉图尔所言的“准客体”（quasi-objects），即自身包含着行动可能性的社会行动者。准客体与其他行动者产生联结，它们必须被放诸于实践的网络中才能得到理解。

我们再回到威廉斯的电视研究来看。选择在“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症候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之后，威廉斯尝试区分出“电视的历史”和“电视的使用历史”两条研究脉络：“电视的历史”意味着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手段”是如何在社会中产生、发展、演变、以及被投入使用的；而“电视的使用历史”则展示出这一新媒介是如何从公共空间介入个体的私人生活之中，又如何通过个体的使用“出离”私人生活，产生了“与之相伴随的、新的、混合的文化形式”（Williams, 2003: 77）。威廉斯尤其强调的是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如何通过使用者能动的技术实践展现出新的生活方式：包括“记录现实的戏剧化呈现”“通过观看接受教育模式的兴起”“更切近的公共会谈方式”“视觉移动性文化的出现”，等等（Williams, 2003: 69-76）。在后者的这条脉络中，电视所带来的可能性绝非它“先天的”技术性特征（这种特征往往是源自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需求），而是来自于其生产出新文化形式的可能性（这种新文化的产生必须要依托受众能动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恰恰是ANT对技术物“去本质化”视角的核心要点所在。

如此一来，威廉斯事实上开创了一条有别于美国盛行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媒介观的研究路径：（媒介）技术自有的逻辑并不能足以完全说

明技术的社会影响，对技术的理解总是要放置在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关注技术的使用者如何能动地“利用”技术去改变环境，创造新的实践方式。用ANT的术语来说，即关注“技术的实践网络”（Latour, 1996a）。彼时的威廉斯尚无法清晰定位诸如广播、电视这样的“新媒介”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角色，因为它们既非传统意义上服务于公共交往的“公共技术”（如铁路、路灯），也非个体意义上独享的“私人技术”（电灯、家具）：它们总是既服务于家庭生活又满足了具备移动性的公共交往。为此，他采用了“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这一术语来指代这些新的媒介技术，它们的“使用形式是其多样趋向的社会化产物”（Williams, 2003: 19-20）

遗憾的是，威廉斯并没有如拉图尔一样，去尝试构建“媒介社会学的方法论”——拉图尔则通过对技术的实践网络的考察提出ANT作为社会理论的新方法论模型（Latour, 2005）。用他的话来说，“为了改变这些极端的观点（指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症候论——引者注）需要的是长期的、相互协作的智识性努力”，而本书所要做的工作仅仅是聚焦于电视这一特殊的媒介，从而“使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它的使用（效应）”（Williams, 2003: 7）。但是威廉斯对于“技术实践轨迹”的考察路径却没有就此终结：二十年后，同属欧陆媒介社会学传统的西尔弗斯通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重新考察了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在这里，ANT与媒介研究有了第一次切实的相遇。

二、信息传播技术的“行动者网络”：西尔弗斯通的“驯服”研究

2003年，威廉斯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在Routledge再版以后，西尔弗斯通为其撰写了一篇精炼的序言。西尔弗斯通盛赞威廉斯的书“提到的话题仍然是今天和未来媒介研究的议程之一”，因为他“拒绝将电视视为一种技术本身”，而是“对人类的能动性——即我们去干扰、打断、分散冷冰冰的历史和技术逻辑的能力——充满信念”（Silverstone, 2003: viii, xi）。事实上，在西尔弗斯通本人对电视的考察中也处处充满了威廉斯的“影子”。以下是他在著作《电视与日常生活》（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对自己研究方法澄清：

我试图寻求一种更为可测量的研究方法，它依托于对于动态的、不平等的日常生活政治的理解……它包含将电视和电视受众定位于研究中心，从而确证两者是相互建构（mutually structuring）、相互塑造、相互再造以及相互改变的。这意味着

两者既贡献又受制于社会和技术的变迁（Silverstone, 1994: 161）。

可以说，西尔弗斯通重现了威廉斯对于电视的“两重性”（技术与文化形式）的理解方式。但是与威廉斯经验性的描述相比，西尔弗斯通的研究框架则更为系统，他将研究的出发点定位于“公共技术的私人使用”之中，从而开展了著名的传播技术的“驯服”（domestication）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考察信息传播技术如何进入私人生活，西尔弗斯通和大卫·莫利（David Morley）领导了一批关于家庭与媒介使用之间关系的文化研究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团队发现，由公共空间所生产和制造出来的技术，在进入作为私人空间的个人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动态互动过程。西尔弗斯通首先采用“驯服”这一术语来指代这一过程。在传统意义上，“驯服”指代的是个体如何驯服野生动物，使其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一方面，野生动物存在着自身的“天性”，需要被人类所规训，从而融入个体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驯服野生动物使其归顺人类，也使得人们可以超出自身的生理性约束，拥有胜于自身身体机能的生产能力，从而更好的进行公共空间的活动（例如驯化牛使得其代替人类进行劳作）。西尔弗斯通将其隐喻性的嫁接至信息技术的私人使用之中，意在表明主体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方面的互动过程：个人既可以利用技术本身的“客观属性”，从而合理地利用技术满足自身的私人目的，而且在这种使用过程中，由于技术对人机能的拓展，也使得个体能够更好的参与到公共空间活动之中。因此，西尔弗斯通强调了信息技术的两重属性，它们既是“物品”（objects）又是“媒介”（media）：

信息传播技术是一种物品，正如家庭中的其他财产一样，个体因为它们的审美、功能、价值等因素所购买……但是信息传播技术又是一种具有功能性意义的媒介，它们积极、交互或消极地使得家庭、家庭的个体成员与门外的世界发生关联，它们成功（或失败）地以复杂且矛盾的方式建构这种联系（Silverstone et al., 1992: 15）。

为了进一步描述这种“驯服”过程，西尔弗斯通区分了信息技术进入家庭生活的四个阶段：

买一台电视机并带回家中。

2.物化（objectification）：个体依据所占有的技术的功能、类型、审美等特点，对于其进行实际处理的过程。例如将电视机摆放在客厅正中间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生活家居装饰的典型象征。

3.融入（incorporation）：技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尽管有时候，这种使用往往与之前购买的初衷不同。例如父母基于方便学习的目的为子女购买电脑，但在电脑实际“融入”子女日常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往往成为了一种娱乐工具（游戏、上网、音乐）。

4.转化（conversion）：技术脱离私人生活范畴，因个体对其使用和实践的过程重新“转化”进入公共空间。例如消费朋克音乐的群体往往因其兴趣相投，组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社群（Silverstone et al., 1992: 20-26）。

通过这四个阶段的描述，西尔弗斯通强调信息技术与个人消费之间的辩证转换关系：在“占有”和“物化”阶段，个人对于技术的利用仍然局限于技术本身的“客观属性”；但在“融入”阶段，个人已经可以依据其“主观愿望”重新利用并改造技术；在“转化”阶段，有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伴随着技术的私人使用而出现，并使个人可以凭借信息技术返回公共空间。因此，西尔弗斯通将信息传播技术与个人实践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ed），技术是一种物品，在私人的使用中展现其工具性意义；技术又是一种媒介，正是这种使用本身产生了新的意义，使技术使用者可以与公共空间发生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与威廉斯对技术“本质”之双重规定的强调相比，西尔弗斯通已经对于技术的主体性考察（即考察技术发展的历史和技术使用的历史）转向“技术-使用者”这样一对模型之中，或者用ANT青睐的术语来说，西尔弗斯通在“驯服”研究中做的是“技术-使用者之‘行动者网络’的考察”。这意味着不仅存在着作为“行动者”的技术的一面——这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客观属性对个体使用的制约，也存在着对作为“行动者”的技术使用者的考察——这体现在使用者对技术的“融入”与“转化”，即使用者的“能动性”（agency）。更进一步来看，西尔弗斯通的辩证模型将我们带入到ANT对于“联结”的强调，诚如上节所做的分析，行动者“去本质化”意味着不存在着单个的行动者，而只存在着诸种行动者所构成的“联结”（网络）。ANT反对将行动者视为处于某个特定结构中特定位置的个体——正如功能主义社会学将行动者视为一个“占位符”（placeholder），承载特定的力量履行特定的功能；在拉图尔看来，“我们从来没有面对单个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而是整个强关联与弱关联的诸联结（associations）”（Latour, 1986: 277）。同样，用西尔弗斯通的视角来看，技术的“驯服”意味着特定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与具体使用者包含实践意图的“能动性”相“联结”。

这一理论上的亲缘性也使得西尔弗斯通很快注意到同时期ANT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但是他却认为，推崇“网络”（network）的ANT学派，没有理解所谓“社会-技术系统”（social-technical system）分析的真正含义。在西尔弗斯通看来，电视就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作为“系统”的电视，意味着它“既是物质技术又是社会现象”，“该技术之系统性关系嵌入了一种长久的、易断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Silverstone, 1994: 84）。针对ANT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劳（John Law），西尔弗斯通发表了一段长长的批评，意在强调需要理解“技术系统”而非“技术网络”：

劳试图用“网络”来代替“系统”这一观点……针对系统的隐喻，劳认为它低估了正在浮现的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它本身嵌入到充满斗争性的环境与境况之中…劳反驳道“其他的因素——自然的、经济的或者技术的——可能比社会更为顽固，从而抵制系统的构建和重塑它们的行动”。然而，个人仍然可以承认社会的优先性：事实上，个人必须承认它。因为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因素无论如何顽固或者如何脆弱，必须要通过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才能获得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网络的观点并没有比关于系统的观点更为有意义（Silverstone, 1994: 84-85）。

显然，在对于“技术-社会”之关系的理解中，西尔弗斯通并没有站在“激进的”ANT一方。针对劳（或者说ANT）的“社会去本质化”观点，西尔弗斯通认为他忽略了既定的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作用——即ANT的行动者必须在“社会行动”中才能获得意义，这种社会行动自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与当前既存的“系统”（用西尔弗斯通的术语来说）密切相关。在文后的一段注脚中，西尔弗斯通借用Knut Sørensen的研究，批评ANT“低估了‘科学和技术’机制的影响”以及“忽视了既存网络结构抵制行动者改变的能力”（Silverstone, 1994: 180）。

在西尔弗斯通对信息传播技术“行动者网络”（尽管西尔弗斯通更倾向于使用“系统”一词）的考察那里，ANT在欧陆媒介社会学研究短暂邂逅之后又迅速分离。西尔弗斯通以“驯服”为主要研究框架探寻信息传播技术与私人实践之间的动态关联，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的媒介社会学研究者。但在后续的研究中，ANT始终

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之中。那么,传播研究与ANT的“联结”就此终止了吗?答案却是否定的。新千年以来,随着欧陆媒介与社会研究“媒介化学派”(mediatization school)的兴起,ANT又与传播研究实现了新的重逢。

三、作为“行动者”的媒介:“媒介化”研究崛起

传播“驯服”研究的传统并没有随着2006年西尔弗斯通的离世而彻底消失。他所开创的“技术-使用者”之“网络”的分析框架无疑奠定了后续媒介社会学传统的研究基础。Maren Hartmann在新千年对驯服研究的重访中发展了西尔弗斯通的“双重勾连”:媒介技术不仅是一种物品(object),也不仅是一种信息渠道(message),还是一种情境(context);因此,存在着技术和使用者的“三重勾连”(Hartmann, 2006)。情境这一术语暗示出个体在私人实践中的媒介使用可能建构出一个新的交往环境,从而使得这一实践行为能够跨越“家庭”的界限,形成一定程度的公共空间活动,尽管这种交往行为往往依托于媒介这一载体。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相较于真实的现实互动,它可能是“虚拟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情境”完全由媒介所建构,完全依托于媒介技术这一载体所呈现,也不得不受制于媒介所提供的“可能性”。

更进一步来说,媒介的提供的情境事实上是“媒介化的情境”(mediatized context)——它受制于一系列既定媒介的“媒介逻辑”(media logic)。这儿关切的问题显然是对于“技术的社会影响”的重新考察。在过往的传播理论史中,媒介的效果研究一直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二分,并且由此展开了两条相异的理解媒介与社会的研究路径:首先是以英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学派。他们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变革是由该时期所主导的特定媒介所带来的,依据媒介发展史,人类依次经历了口语、书写、印刷、和电子时代。换言之,他们强调的是媒介“形式”对于社会文化的塑造作用;其次是以功能主义研究为代表的“效果研究”(effect study)进路:他们认为媒介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于其传递的内容对于受众或是短期或是长期,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可测量的影响”。换言之,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媒介“内容”对于个体的影响效果。

在Hepp等人看来,这两条进路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两个缺陷:(1)将媒介研究中“形式”与“内容”分离,两者对于媒介的影响都太直接而忽略另一面的作用;(2)将媒介视为“抽离”(outside)社会之外的一种独立要素,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处于的是“被媒介穿透的社会”(media-saturated society),换言之,媒

介正是在社会之内（Hepp et al., 2010）。为了克服现阶段“媒介的社会影响”之研究范式的缺陷，欧陆传播研究学者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对“媒介化情境”的系统性考察：这一情境在微观层面（micro-level）可以是针对个体交往和人际互动“媒介化”的考察；在中观层面（meso-level）可以是新闻媒体机构如何“殖民”（colonize）具体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Hjarvard, 2013）——例如“媒介化政治”（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Strömbäck, 2008）——的研究；在宏观层面（macro-level）可以是数字媒介如何转向“元媒介”（metamedia）（Kay & Goldberg, 1999），以及如何在“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层面构型社会形态（Krotz, 2007）。我们在事实上面临的是一个所有生活情境都被媒介穿透的时代，而通过对现实的穿透，媒介又构建了新的交往情境。这一“穿透”的过程，就是“媒介化”过程：

媒介的主要‘影响’在于，通过占有（appropriation）或驯化（domestication）以技术为基础的交往活动，它们对于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产生了长期的、不断增长的相互渗透作用（interpenetration）——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媒介化（Hepp & Krotz, 2007: 2）。

基于此，欧陆学者陆续从“媒介研究”（media study）转向“媒介化研究”（mediatization study），从而开启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媒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变革。诸如Stig Hjarvard、Knut Lundby、Friedrich Krotz、Nick Couldry、Andreas Hepp、Klaus Bruhn Jensen等学者已经组建成了颇具规模的“媒介化研究团队”，试图重新锚定媒介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曾撰文详细分析了媒介化研究的理论发展路径以及研究范式（戴宇辰，2016；戴宇辰，2018），在此就不重复展开。总的说来，媒介化研究强调的是，媒介——或者更广义的说，信息传播技术——已经开始摆脱传统传播研究中的“中介性角色”，而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构型过程。正如Hjarvard所言，“媒介不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形塑（mould）互动发生的方式”（Hjarvard, 2004: 44）。

就本文讨论的主题来看，“媒介对社会的形塑”重现的无疑是“威廉斯——西尔弗斯通”媒介社会研究路径的经典命题：首先，媒介并不是“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中的“工具性”角色——仅仅是社会形态的一个反映，以其自身的技术逻辑满足既定的功能性需要；其次，媒介也并非“技术决定论”路径下的社会形态的塑造

者——以其自身的“偏向”决定社会的变迁方向。在媒介化的视域中，媒介是介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症候论”（威廉斯语）之间的“社会形塑力量”（social moulding force）。正是在这里，Hepp建议媒介化研究引入ANT的技术社会学视野：

布鲁诺·拉图尔论述的核心在于诸如媒介这样的工具最终是人类行动者们“凝聚的行动”（congealed actions）。以一个非典型媒介为例子：一段楼梯扶手只是人类具体保护某人以免坠落的行动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这意味着物本身必须被视为与人类行动“联结”（association）的、行动着的物。正如拉图尔所言：“根据我们的定义，工具是行动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参与到等待被具体构型的行动序列之中”（Hepp, 2013b: 620）。

无疑，Hepp提倡的是对媒介的“去本质化”研究。这意味着媒介化研究不是去探寻媒介本身的技术逻辑如何作用于社会机制，产生了哪些既定的社会效果；而是要考察“媒介的形塑力量”（the moulding forces of the media）（Hepp, 2013a: 54-68）：即具体的媒介是以何种方式对社会的传播渠道实施“压力”。例如，电视的“形塑力”在于使得任何具体的观点必须在视觉上变得“可见”；纸质媒体的“形塑力”在于它们可以使得观点的讨论出现更为复杂的互动，牵扯到一系列的与主题相关的元素；移动媒体的“形塑力”在于使得使用者在无时无刻都必须与他人保持“关联”——即使个体退却至私人场所，他也可以随时在社交网络上与他人互动。并且，媒介“形塑力”得以可能的条件是它必须介入与具体使用者的传播活动之中，必须让使用者“占有”或者“驯服”了它。从这个角度来看，探寻媒介的形塑力——或言考察具体的“媒介化情境”，意味着理解与媒介相联结的“行动者网络”。

更为重要的是，ANT方法论的创新带来的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拓展。Hepp认为，引入ANT意味着媒介化研究必须走向一种“共时性研究”（synchronous research）。拉图尔在对科达相机和摄影爱好者群体关联的研究发现，并不存在着一种“新媒介”（科达相机）的发现，进而带来一个更广泛的使用群体（摄影爱好者）对媒介的“驯服”这样类似的历时性发展轨迹；相反，相机的进步是与使用群体的“大众市场”同时出现的（Latour, 1991）。换言之，ANT的共时性研究启发媒介化研究意识到“媒介带来的社会变革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运作——即正在兴起的新媒介和与之相伴随的媒介实践之勾连是相互交织（interweaving）在一起的”（Hepp & Hasebrink, 2014: 266）。正因为此，在媒介化的经验考察中，研究者就

不能人为地设定某种“新媒介”是如何因其技术逻辑兴起，又如何对社会施加具体影响——研究者必须意识到，媒介的技术发展与媒介的现实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共时的”。

在欧陆崛起的“媒介化”研究中，ANT和媒介理论实现了再一次重逢。Hepp强调媒介之所以能够建构“媒介化”的情境是因为媒介本身是“诸行动的物化”（reification of actions），它凝聚着一系列行动者的现实行动，“通过这种物化形式来对人类的行动产生影响”（Hepp, 2013b: 620）。因此，媒介化研究意味着研究者必须置身于特定的“媒介化情境”中去将媒介与媒介实践勾连起来，用ANT的话来说，去描绘所有行动者（包括作为“物”的媒介和人类行动者）的“轨迹和部署、路径和踪影”（Latour, 2000: 12），也就是说，“追寻行动者的踪迹”。

四、ANT与媒介（化）研究：已有的成果和可能的未来

在本文中，我尝试勾勒出一条“另类的”（alternative）媒介社会学研究脉络，这一思考的起始点在于“媒介如何影响社会”：在威廉斯那里，作为新媒介的电视是一种“流动的藏私”，存在着电视的技术发展和电视的社会使用两条相异的发展轨迹；到了西尔弗斯通那里，威廉斯以技术为主体的考察转向了“技术-使用者网络”这样一对交互模型之中，传播的“驯服”研究正是为了描绘“公共空间的技术如何被私人占有”。也就是说，存在着技术和技术使用者的“双重勾连”；最后，媒介化研究将驯服研究所提示的“情境”要素作为考察媒介社会影响的关键变量，媒介化社会意味着一种依托媒介逻辑而兴起的“媒介化情境”的出现。媒介的影响机制由其技术带来的线性效果论转向“社会形塑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一条理论脉络中，ANT（或者ANT视角）并没有与媒介研究彻底分离开来：在“流动的藏私”中，它体现为威廉斯对于“技术决定论/技术症候论”之二元模型的反；在传播的“驯服”研究中，它体现在西尔弗斯通对于“技术-使用者”之行动者网络的考察；而在“媒介化”研究中，Hepp更是提倡通过ANT的方法论来探讨媒介的社会形塑力量，提倡一种共时性研究的具体经验操作方法。

拉图尔尝言，自己的理论研究寻求的是一种“实践系谱学”（pragmatogony），即在历时性的维度中追踪“物的起源”（genesis of things）（Latour, 1999: 176）。有学者用“行动本体论”（ontology-in-practice）来概括拉图尔的本体论承诺亦是遵循了这条思路：事物及其影响必须放置在其所处的“实践网络”中才能得到理解（林文源，2007）。细化以媒介为主体的传播学研究框架中，这提醒我们要区分出关于“媒介本身”的研究与关于“媒介的实践过程”

的两种研究路径（Couldry, 2004），并且需要关注这种实践过程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它如何反向改变媒介使用者对既定“媒介本身”的理解。欧洲“媒介化”团队最近试图通过“传播型构”（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这一概念去考察具体情境的媒介化事实上亦是遵循着这一思路（Hepp et al., 2018）。这种动态性的研究视野与ANT对于物的“实践网络”强调不谋而合。ANT对于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也得到了Couldry的印证：“ANT在20世纪90年代与媒介社会学的分离是非常令人遗憾的”，ANT仍然是理解媒介之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箱（Couldry, 2008: 107）。那么具体而言，ANT能为传播研究者们带来什么？笔者认为，ANT至少为未来的媒介（化）研究提供了三个层面的启发：

在微观研究层面，摆脱功能主义传统中媒介作为一种“工具”（tool）的观点。主流的功能主义研究一直媒介视为一种“工具性角色”（Lazarsfeld & Melton, 1957; Lasswell, 1948）。ANT特别强调的是，人造物并非单纯客观的、中立的物质材料，而是凝聚了诸种缺席的、形塑我们社会互动的物质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媒介就应当被视为一种“建立网络的行动者”。媒介包含和再生产的是“凝聚的劳动”（congealed labour）：“我们遭遇到的是那些缺席的制造者，他们既在遥远的时空之外，同时又活跃于当下”（Latour, 1994: 40）。如果说在功能主义研究中媒介还仅仅只是某个具体的人类行动者（或者社会机制，例如政府）的“中介者”（intermediary），发挥“表征”（represent）代理人的意愿；那么在ANT中，媒介本身已经成为了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 with agency），有能力通过“转译”（translation, ANT术语）的方式实施社会行动。像Emma Hemingway就曾利用ANT视角研究新闻生产中“诸如摄像机、卫星、现场直播工具等媒介是如何成为编辑室网络中的行动者”（Hemingway, 2009）。与之类似的还有Ursula Plesner对记者工作中媒介行动者的考察（Plesner, 2009）。

在社会中观研究层面，媒介机构（media institution）必须被“机制化”（institutionalized）——媒介机构成为了其他社会机制交融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ing point）。卡龙和拉图尔强调，一个“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定化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着一个“必经之点”，与之相联结的其余行动者可以依据自身条件转化行动意愿（Callon & Latour, 1981: 287）。而在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机构就是这样一个必经之点。这一点事实上为我们理解“媒介权力”（media power）这一主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首先，媒介可以介入甚至影响其他社会机构的日常交往，例如，媒介作为一种独立性的要素渗透进家庭生活、政治活动、宗教组织、企业运营等等其余与之相对立的社会机制之中。其次，媒介作为普遍社会实践的“手

段”，又可以掌握着一定程度的交往资源分配：社会整体仿佛一张依托媒介相互勾连的“网络”，各个独立的社会机制恰如网络中的各个“节点”，那么节点的“现身”或者“缺席”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媒介恰恰就是保障这些节点能够“在场”的“必经之点”。这也体现在了Couldry早期对媒介权力的考察：媒介的权力不是来自“对于图像和话语的普遍循环生产，也不是某种禁锢社会实践的外部事物；相反，它通过诸社会实践本身被生产出来”（Couldry，2000：5）。

在宏观理论层面，将“媒介的社会影响”这一研究主题转变为“媒介的社会形塑”。这意味着抛弃经典“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社会变迁）与“技术反映论”（技术反映社会变迁）的机械二分。ANT启示我们，存在着技术与技术使用者的“相互形塑”。媒介社会学研究应从单一的线性决定转向一种更为交互的“过程性”考察框架——即“媒介生产”与“媒介消费”联结的过程，正如威廉斯与西尔弗斯通在不同层面上考察了受众媒介消费的“能动性”。亦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入手，探讨ANT提供的中层理论可以以“网络”“联结”此类地方性概念代替以往传播媒介研究中诸如“结构”“整体”这样的宏观概念，从而将“媒介化”本身理解作为一种聚焦实践过程“行动化”框架（方念萱，2016）。总的说来，ANT视域下的未来媒介研究应该更加关注于以下三个方面：（1）新媒介技术的“驯服”；（2）媒介使用者在技术使用中的“能动性”；（3）媒介使用者对新技术的抵制，及其开创的另类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也必须关注一些可能在中国语境中开启与欧陆媒介社会学传统以及ANT对话的研究成果，例如由复旦大学信息传播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主持的“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团队的研究视角就似乎与前述传统有着相互关联之处。该团队强调新范式的媒介研究应当关注：（1）以媒介为研究主体，关注特定的媒介如何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2）着重考察“媒介实践”，去除功能主义中所包含的媒介之“工具性意指”；（3）推崇非本质论和非目的论的研究史观，关注媒介在不同文化地区的“地方性实践”；（4）避免任何本质论（例如媒介的本质，社会的本质）的先天判定（黄旦，2015）。这四点恰恰与ANT所推崇的“技术的社会形塑”不谋而合：（1）对技术物去本质化的理解，不存在技术的先天本质或者功能性内涵；（2）将技术理解为网络中的“行动者”，考察技术实践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3）以“网络”“联结”等地方性概念替代“结构”“整体”等宏观概念，从而将“地方性”（localization）与“全球性”（globalization）串联（Latour，1996b）。

一些立足于本土新闻史的经验研究亦可以佐证这种关联：例如黄旦教授通过对戊戌变法时期晚清文人办报活动的考察，展示出基于原先固有关于媒介的“旧知

识”是如何通过媒介实践溢出自身框架，“开辟出新的政治交往关系”（黄旦，2012）。这种媒介实践活动不仅可以建构新型的社会联结，也可以“重塑”传统的权力中心及其关系网络（孙藜，2015），并且以其自身逻辑（媒介逻辑）去“形塑”传统（政治）场域的交往关系（黄旦，2016），甚至可以“消解”该媒介原先依托的社会结构，“生产”出关于它的新的文化形式（黄旦，2017）。这种反对本质论、推崇技术（媒介）实践的研究视角也可以从ANT反复强调的追踪“行动者网络”的考察方法中找到共鸣乃至可以相互对话的地方。

总之，在过往理论的史中，ANT从未与媒介理论彻底远离；新世纪兴起的“媒介化”研究无疑与作为“旧相识”的ANT开展了一次“新重逢”。这一重逢激活了自威廉斯以来被掩盖的媒介社会学研究遗产。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来说，未来的课题应当着重关注于诸如（1）特定的（新）媒介（微信、微博）如何作为行动者形塑日常生活的互动方式（2）使用者的“媒介实践”是如何溢出媒介本身的“旧知识”产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关系——例如诸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互动媒介与居民城市体验的“互构”（3）媒介权力如何通过自身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必经之点”所施展——例如对“组织机构的媒介化”（互联网、公众号、公关关系）、“营销的媒介化”（淘宝、京东）、“时尚的媒介化”（时尚博主）等议题中媒介权力的考察。这些问题同时也敦促着我们审视过去，摆脱萦绕于身的固有偏见，转而以崭新的姿态拥抱可以预见的未来。

（责任编辑：吴欣慰）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戴宇辰（2016）。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5），47-57。
- 戴宇辰（2018）。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2），147-156。
- 方念萱（2016）。媒介化、行动化：媒介化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话。《传播、文化与政治》，（4），55-83。
- 黄旦（2012）。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11），127-145。
- 黄旦（2015）。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12），5-19。
- 黄旦（2016）。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6），22-45。

- 黄旦（2017）。“奇闻异事，罔不毕录”：上海“城”的移动——初期《申报》研究之二。《学术月刊》，（10），141-161。
- 黄典林（2016）。重读《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兼评斯图亚特·霍尔对传媒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5），58-72。
- 黄典林（2018）。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国际新闻界》，（6），68-87。
- 江淑琳（2016）。科学科技研究（STS）与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之美丽邂逅。《传播、文化与政治》（台湾），（4），i-v。
- 林文源（2007）。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行动本体论。《科技、医疗与社会》（台湾），（4），65-108。
- 孙藜（2015）。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12），37-61。
- Boczkowski, P., & Lievrouw, L. A. (2008). Bridging ST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holarship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Hackett, E. J., Amsterdamska, O., Lynch M. & Wajcman, J. (Eds.).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pp. 949-977). Massachusetts, MA: The MIT Press.
- Callon, M. & Latour, B. (1981). 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 How actors macro-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to do so. In Knorr-Cetina, K. & Cicourel, A. V.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s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sociologies* (pp.277-303). London, UK: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0). *The Place of Media Power: Pilgrims and Witness of the Media Age*. London, UK: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14(2), 115-132.
- Couldry, N. (2005). Transvaluing media studies, or, beyond the myth of the mediated centre. In Curran, J. & Morley, D. (Eds.). *Media and Culture Theory* (pp. 177-194). London, UK: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8).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edia: Do they connect and on what terms? In Hepp, A., Krotz, F., Moores, S. & Winter, C.(Eds.).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pp. 93-110).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Inc.
- De Valck, M. (2006). *Film Festivals: History and Theory of a European Phenomenon that Became a Global Network*. Amsterdam, NED: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Gitlin, T. (1978).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2), 205-253.
- Friesen, N. & Hug, T. (2009). The mediatic turn: Exploring concepts for media pedagogy. In Knut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s, Changes, Consequences*(pp. 63-84).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Hartmann, M. (2006).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 In T. Berker, M. Hartmann, Y. Punie & K. J. Ward (Eds.). *The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pp. 80-102).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epp, A. (2013a). *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 London, UK: Polity Press.
- Hepp, A. (2013b).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6), 615- 629.
- Hepp, A., Breiter, A. & Hasebrink, U. (2018).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 Hepp, A. & Hasebrink, U. (2014).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tize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Lundby, K. (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pp. 249-272). Berlin, GER: De Gruyter.
- Hepp, A., Hjarvard, S. & Lundby, K. (2010). Mediatization-Empirical perspectives: An introduction to a special issue. *Communication*, 35, 223-228.
- Hepp, A. & Krotz, F. (2007, May). *What 'Effect' do Media Have? Mediatization and Process of Social-Cultural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ICA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 Hemmingway, E. (2008). *Into the Newsroom: Exploring the Digital Production of Regional Television News*. Oxon, UK: Routledge.
- Hjarvard, S. (2004).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I. Bondebjerg & P. Golding. (Eds.).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pp.43-63).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 Hjarvard, S. (2013). *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
- Innis, H.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Kay, A., & Goldberg, A. (1999). Personal dynamic media. In P. A. Mayer (Ed.). *Compute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 Reader* (pp. 111-11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otz, F. (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3), 256-260.
- Krotz, F. (2009). 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in Knut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s, Changes, Consequences* (pp.21-40).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Lasswell, H.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37, 215-228.
- Latour, B. (1986). The powers of associations. In Law, J.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264- 280) London, U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1991).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In Law J. (Ed.).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pp. 103-131). London, UK: Routledge.

- Latour, B.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Bijker, W. & Law, J. (Eds.). *Shap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25-258.). Cambridge, UK: The MIT Press.
- Latour, B. (1994). On technical mediation-philosophy, sociology, genealogy. *Common Knowledge*, 3(2), 29-64.
- Latour, B. (1996a).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Massachusett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1996b). On interobjectivity. *Media, Culture, and Activity*, 3(4), 228-245.
- Latour, B. (1999).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Massachusett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2000). The Berlin key or how to do words with things. In Graves-Brown, P. (Eds.). *Matter, Materiality, and Modern Culture* (pp. 10-21). London, UK: Routledge.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zarsfeld, P. F., & Merton, R. K. (1957).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Rosenberg, B., & White, D. M. (Eds.).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pp. 457-473).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Park, J. & Wiley, S. (2012). *Communication Matters: Materialist Approaches to Media, Mobility and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 Plesner, U. (2009). An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on changing work practice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actants in newswork. *Journalism*, 10(5), 605-626.
-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Routledge.
- Silverstone, R. (2003). Preface to the Routledge Classics Edition. In Williams R. (Ed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pp. vii-xiii). London, UK: Routledge.
- Silverstone, R., Hirsch, E., & Morley, D. (199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In Silverstone, R. & Hirsch E.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pp. 15-31). London, UK: Routledge.
- Strömbä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3(3), 228-246.
- Williams, R. (1995).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liams, R. (2003).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UK: Routledge.
- Williams, R. (2005).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Selected Essays*. London, UK: Verso.
- Wajcman, J. & Jones, P. K. (2012). Border communication: Media sociology and S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6), 673-690.